

移民威胁、经济剥夺还是治理失效

——对上海市 60 个基层社区凝聚力的比较分析

□ 李骏

摘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尤其是欧美学界日益关注社会凝聚力问题,重点围绕种族多样性是否会削弱社会凝聚力展开了理论争辩与实证分析。相比之下,中国虽然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但相关的研究却十分缺乏。本文使用来自上海市 60 个基层社区及其成员的两层次匹配数据,对社区凝聚力的影响因素依次检验了移民威胁、经济剥夺和治理失效三个命题。结果发现:移民不仅没有损害社会凝聚力,甚至可能具有相反效应;社区经济剥夺固然会削弱凝聚力,但也受到社区治理绩效的补偿;在中国城市社会的制度背景下,基层社区的治理绩效成为社会凝聚力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上述经验证据在汇总层次分析和多层次分析中均具有高度一致性。

关键词: 移民; 治理; 社区; 凝聚力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2018)02-0023-08

一、社会凝聚力:概念与测量

进入 21 世纪,社会凝聚力问题备受学界关注,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许多政府或研究机构都竞相开发社会凝聚力指标体系。例如 2001 年,欧洲委员会正式制定了社会凝聚指标体系——Laeken 指标体系;斯坎伦基金会和莫纳什大学共同开发了“斯坎伦-莫纳什社会凝聚力指标”,用来研究澳大利亚社会凝聚力的动态变化;贝塔斯曼基金会于 2013 年提出了“社会凝聚力雷达”指标体系,以对发达国家的社会凝聚力开展比较研究^{[1][2][3]}。

在学术界, Jensen^[4]首次论述了测量社会凝聚力的五个维度,包括归属/孤立、嵌入/排斥、参与/被动、接纳/拒绝、合法/非法。Bernard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综合的测量框架,既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领域,又包括态度、行为两个维度^[5]。Chan 与其合作者^{[6][7]}不同意经济是社会凝聚力的一个必要成分,相反只是社会凝聚力程度的一个影响因素,因此将其排除,并提出了一个由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以及主观与客观两个成分交叉形成的测量框架,并将之应用于香港的社会凝聚力调查研究。Dickes 等人认为,在排除了经济领域后, Bernard 和 Chan 等人的社会凝聚力测量框架其实是相当吻合的:前者所说的社会文化领域正对应后者所说的横向维度,前者所说的政治领域正对应后者所说的纵向维度,同时这两个测量框架又都包括了主观态度与客观行为两个方面。他们对 33 个欧洲国家调查数据的分析,确证了 Bernard 和 Chan 等人的社会凝聚力测量框架。

可见,两股力量共同推动了社会凝聚力指标的开发:一个是政策、市场或社会部门的研究,一个是学术研究。Chan 等人就将社会凝聚力的研究归纳为两种论述:政策的和学术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指出,以往某些研究对社会凝聚力的定义和测量往往将凝聚力的实质内容和决定因素混淆或合并在一起,

作者简介: 李骏,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特大城市的基层社区分化与分类治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15CSH075)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都市社区调查”和“上海社会凝聚力调查”。“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 由上海市“高峰高原”计划社会学 III 类高峰计划资助,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s, CENDUS) 负责执行。“上海社会凝聚力调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立项开展。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和项目组参与人员的贡献。

收稿日期: 2018-01-10

这其实妨碍了对社会凝聚力的深入实证研究。因为,如果对某概念的测量指标中包含其决定因素,显然,当进一步研究这些决定因素对此概念的影响时,将会在逻辑上存在同义反复的问题,所以,需要摒弃这种定义和测量方式,只对社会凝聚力本身进行概念操作化。他们根据这一原则和自己的测量框架,将社会凝聚力定义为“社会成员之间纵向与横向之间的互动状态,它由信任、归属感、参与和互助意愿等一系列态度、规范以及行为表现来反映”。

社会凝聚力有时也在社区层次上被讨论,最著名的是 Sampson 等人^[8]在“芝加哥社区人类发展研究”中提出的集体效能感概念,它包括社会凝聚与非正式社会控制两个子概念。这里的社会凝聚由五个李克特态度题项构成,分别是:这个社区的人们可以信任、这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社区、这里的人们愿意帮助邻居、这个社区的人们相处并不融洽、这个社区的人们并不共享相同的价值观。显然,其含义与 Chan 等人对社会凝聚力的定义与测量有共通性,都涉及归属、信任、互助等。Lochner 等人^[9]曾经从社会资本的理论角度将社区层次的相关概念分为四组:集体效能感、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社区能力,认为它们是交叉重叠的。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凝聚力与社会资本是有所交叉但彼此不同的两个概念。社会资本概念与理论主要来自布迪厄、科尔曼、普特南三人的经典论述,但在涵义上却存在分歧^[10]。在布迪厄那里,社会资本是个人或家庭所掌握的一种资源,它嵌入关系网络并能够转化为其他资本(例如经济和文化资本),它本质上是个人或家庭的一种能力。但在普特南那里,社会资本却是一种公共品,指群体、城市、社会或国家层次上公民之间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它本质上是社会的而非个人或家庭的。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则介于布迪厄和普特南两人之间。因此,社会资本一直存在“个体性 vs. 社会性”这两种研究路径。反观学者们对社会凝聚力的理解,倒是存在“社会性”这一共识。Dickes 等人就曾指出, Bernard 和 Chan 等学者都将社会凝聚力看做是群体或社会性的,而非个体性的。从“斯坎伦-莫纳什社会凝聚力指标”与“社会凝聚力雷达”等指标体系的构建方式来看,测量的都是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水平。在国内屈指可数的社会凝聚力研究文献中,学者们对社会凝聚力的“社会性”也存在共识^{[11][12][13]}。

那么,“社会性”社会资本与社会凝聚力是否又等同呢? Chan 等人指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从逻辑上来讲,高存量的社会资本并不必然意味着高存量的社会凝聚力。例如,在一个存在严重种族隔离的社会中,种族内部成员之间的网络、信任、规范可能很高,但种族之间的联系却可能非常之少,这样的社会显然不具有高度的社会凝聚力,相反它只能是一个分裂的社会。Portes and Vickstrom 也认为,普特南的社会资本与社会凝聚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可以理解为以滕尼斯的“社区”概念和涂尔干的“机械团结”概念为代表的“社群性”,而后者则同时取决于“社群性”和“国家-社会协调机制”。这两个维度的高低状况组合,可以形成社会凝聚或社会团结的四种形式或类型:有机/机械团结、有机团结、机械团结、社会崩溃。

综上所述,社会凝聚力是一个独立的、有意义的概念,并且可以进行测量和实证研究。

二、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因素:移民威胁还是经济剥夺

过去几十年来,欧美发达国家普遍、持续吸纳了大规模的合法与非法移民、外来劳工、少数族裔,导致其基本人口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因此,欧美学界的社会/社区凝聚力研究,重点围绕种族多样性是否会削弱社会凝聚力展开了理论争辩与实证分析。

对这个研究问题的实证探索,最早发端于美国,并且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即种族多样性会削弱社会凝聚力。Alesina and Ferrara^[14]是此研究的先行者,他们对美国各州的比较研究发现,种族多样性与人际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并将此解释为社会心理学所说的“同质性偏好”。Costa and Kahn^[15]也有同样的发现。但是,使此研究议题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同时也受到更广泛检验的则是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普特南。他在 2007 年一个主题演讲中,根据对美国各州的一些初步数据分析提出,种族多样性对社会凝聚力的损害将是全方位的,不仅影响多数族群也影响到少数族群,不是影响社会凝聚力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而是影响其所有方面,并将其称为“退缩假设”(hunkering down hypothesis)^[16]。

然而,当研究者将目光从美国转移至欧洲,同时将分析单位从地区细划至社区时,却发现多样性对凝聚力的负面影响在经验证据上却并非那么确凿。这些后续研究还不约而同地纷纷强调,在中观或宏观社会层面上,种族多样性与其他多种社区特征可能存在密切关系,因此在经验研究中必须排除其他社区层次变量的影响,如此方能得出种族多样性对凝聚力的净影响乃至因果效应。在其他相关的社区特征或变量中,最受重视的就是社区贫困或社区剥夺。

Stafford 等人^[17]以英国和苏格兰的社区为分析单位,考察了物质剥夺、种族多样性与社区凝聚力之间的关系。他们开发了一套社区社会凝聚力的测量工具,由结构和认知两方面指标构成,前者包括家庭关系联结、朋友关系联结、组织活动的参与、与更大社会的整合,后者包括信任、社区归属、实用帮助、容纳或尊重。他们最大的发现是,社区物质剥夺与社区凝聚力的认知方面存在显著的、一致的负相关;同时也发现,在控制了物质剥夺的影响后,在少数族裔越多的社区,家庭和朋友圈联结越少、信任和社区归属越低、实用帮助也越少,但对容纳或尊重并没有影响。

Letki^[18]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社区种族多样性和社区剥夺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做了分析,发现种族多样性只对社会凝聚力的一个指标即对邻居的态度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对其他三个指标即组织参与、社会交往、帮助行为并没有影响;相反,社区剥夺对社会凝聚力的四个指标倒是呈现出非常一致的负面影响。Tolsman 等人^[19]对荷兰的研究发现与 Letki 十分相似,种族多样性对社会凝聚力各项指标的影响并不具有一致性,但社区经济地位(在所有的社区层次变量中)是对社会凝聚力最重要、负面影响也最一致的情境变量。

Laurence^[20]再次对英国数据用多层次模型检验了社区的种族多样性与社区劣势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他将社会凝聚力分解为社会资本和种族关系两个方面,通过这种研究设计,得到了种族多样性对凝聚力的“二律背反”效应:一方面,社区的种族多样性会降低人们的社会资本;但另一方面,它却会提升人们的种族容纳度。然而,相比之下,社区劣势却对社会资本和种族关系具有一致的负作用。不难看出,Laurence、Letki 和 Tolsman 等人的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处,即社区劣势或社区剥夺才是影响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因素,至于种族多样性对社会凝聚力的负面影响,在某些方面其实部分来自于社区经济地位的影响或根本无影响,但在另外一些方面(例如对不同种族的容纳或尊重)甚至还具有正面影响而非通常假定的负面影响。

此外,Fieldhouse and Cutts^[21]还对英美两国社区种族多样性和社区贫困对社会资本的相对影响力作了比较。他们发现,在英国,两者的影响力相当;但在美国,种族多样性的影响要远远小于社区贫困的影响,且其影响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包括社区贫困在内的其他社区特征的影响。他们认为,这是由美国的种族不平等比英国更严重所导致,相比英国,美国有更深厚的移民历史传统和更复杂的种族多样性,在少数族裔的规模和种族不平等的程度方面有显著不同。这提醒我们,在研究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因素时,不同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情境是一个重要考量。

三、未尽议题与研究问题

除了聚焦社区种族多样性和社区经济地位(或社区剥夺、社区贫困)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外,也有研究涉及社会治理好坏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但大多停留于国家或区域层面,没有细划至城市或地方社区层面。例如,Delhey and Newton^[22]做了六十个国家的社会信任水平的比较研究,发现民主和良好政府对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好的社会治理对社会凝聚力具有积极影响。敖丹等人^[23]通过对中国城镇居民普遍信任的分析发现,普遍信任的区域差异与地区的宏观公共资源存在相关性,在公共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普遍信任的程度也较高。

另外,在上面的各项研究中,有的使用社会凝聚力概念,有的使用社会资本概念,有的将两者混合或互换使用,但前文指出,社会凝聚力不能被认为是个体性的社会资本,也与社会性的社会资本有所不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如果是这样,那么有必要考虑社会资本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虽然它们在某些具体测量指标上看似可能重叠。

国内学界对社会凝聚力的相关研究非常少。武艳华等对深圳的社会凝聚力状况进行了评估,孟祥斐对深圳和厦门两地的社会凝聚力是否影响居民幸福感进行了研究,他们在论述时也都是从社会质量文献出发,将社会凝聚力作为社会质量之下的一个概念。张海东等也明确指出社会质量包括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四个条件性因素,并且对中国六城市的社会质量(包括社会凝聚)作了实证比较^[24]。另外,张蕾^[25]和邢占军、李莎^[26]也对社会凝聚力作了概念层面的介绍。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文献中,对社会凝聚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严重滞后于海外同行。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学界不乏对社区层面邻里关系或社会资本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但却极少从社会凝聚力的视角来论述^{[27][28][29]}。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中国城市社会中,社区特征如何影响社区凝聚力?社区特征主要包括四组变量:第一组变量是移民比例和社区贫困,这是欧美学界最为关注、研究最多的影响凝聚力的社区自身的社会经济因素;第二组变量是社区社会资本,也是社区自身的社会性因素;第三组变量是社区治理,它不再局限于社区自身,而是国家与社会两大主体相结合在社区层面提供服务、秩序等公共品的能力;第四组变量是其他各种基础性的社区特征,例如人口结构和住房结构等。根据上文回顾的既有理论和发现,本文重点关注三个关键自变量对社区凝聚力的影响。首先,就移民威胁而言,是否移民比例越高社区凝聚力越差;其次,就经济剥夺而言,社区贫困是否会削弱社区凝聚力;最后,就治理失效而言,社区治理绩效的好坏是否决定了社区凝聚力的高低。

四、数据、变量与分析

(一) 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的“社区-个人”两层次匹配数据,分别来自于“上海都市社区调查”和“上海社会凝聚力调查”。“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由上海市“高峰高原”计划社会学Ⅲ类高峰计划资助,由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s, CENDUS)负责设计和执行,是一项包括社区、家庭、个人在内的多层次追踪调查。本文只使用其中的居村调查子项目,包括从全市5732个居(村)委会中随机抽取的537个社区,于2015年完成^[30]。“上海社会凝聚力调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15年开展,采用三阶段概率抽样,先分层随机抽取60多个居委会,再在每个居委会随机抽取30多个住户,最后在每户随机抽取1人。另外,对每个居委会,还可以将个体层次的信息平均或汇总为社区层次的信息^[31]。

鉴于“芝加哥社区人类发展研究”和Sampson集体效能感概念的广泛影响力以及该测量工具的简短易用性,本研究以此为基础来测量社区凝聚力。与Sampson保持一致,“上海社会凝聚力调查”也用五个类似的李克特态度题项来测量社区凝聚力,只是在表述方式上稍微作了本土化处理。但对该量表的因子分析发现,只用其中的三个题项来构建社区凝聚力测量效果更好,它们分别是:住在这里的人们愿意互相帮助、这个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近、我可以信任住在这个社区里的人。因此,本研究只使用这三个题项。

社区层次的自变量包括移民比例、社区贫困、社会资本、社区治理以及其他基础特征。移民比例即社区内非沪籍人口占所有人口的比例,反映社区的移民多样性。社区贫困用社区内低保户数占所有户数的比例(简称低保户比例)来测量。社会资本用社区内受访者委托邻居帮收快递的可能性程度均值来测量。调查问卷中的题目是:如果您和您的家人要外出,您是否可以委托邻居帮您代收快递?选项包括:完全不可能、不可能、不好说、多数情况下没问题、完全没问题,依次赋值1-5。社区治理用社区内受访者对本社区居委会的信任和认同均值来测量,由一个简易量表来操作,包括三个李克特态度题项:(1)我信任居委会;(2)总的来说,居委会本届委员的产生反映了本社区大多数居民的意愿;(3)总的来说,居委会做出的决定代表了本社区大多数居民的利益。社区的其他基础特征变量包括社区的商品房比例、老年人口比例与总户数。

本研究将先做汇总层次的数据分析,它是以社区为分析单位,考察上述社区层次自变量对社区层次

凝聚力均值的影响。但仅有汇总层次的分析还不够,如果多层次分析也能得到同样的发现,则经验证据会更确凿。多层次分析是以个人层次的社区凝聚力感受为因变量,同时考察个人层次和社区层次自变量的影响。本研究最终分析的有效样本量为60个社区、1718人。社区层次变量的描述统计反映,上海的基层社区在人口与住房构成、经济与社会状况、治理与凝聚力水平等方面都已经发生较大分化。

(二) 汇总层次分析

汇总层次分析的OLS回归模型结果见表1。由于散点图分析发现移民比例与社区凝聚力的关系可能为非线性,所以这里同时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和半参数回归模型。半参数回归模型将移民比例与社区凝聚力之间的函数形式设定为未知(因此没有回归系数),但仍将其他自变量与社区凝聚力的关系设定为线性(报告回归系数)。

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移民比例对社区凝聚力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移民比例每上升1个百分点,社区凝聚力会上升4.17分。但半参数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图1),移民比例的这种正面影响其实主要来自该变量取值分布的高端(30%~60%),相反,在该变量取值分布的低端(0%~30%),这种影响几乎不存在。因此,根据普特南的“退缩假设”提出的移民威胁命题没有得到本文数据的支持,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发现移民多样性会对凝聚力产生损害;相反,在中国上海非沪籍人口比例较高的基层社区,倒是有移民多样性有益于凝聚力的迹象。注意,由于移民比例变量取值分布高端所含的样本量并不多,需要对该正向影响结论持审慎态度。

社区治理对社区凝聚力的正面影响,在线性回归模型和半参数回归模型中均得到了支持。类似地,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凝聚力之间的正相关,在两个模型中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1还报告了线性回归模型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以比较自变量对社区凝聚力的相对影响大小。结果发现,社区治理的影响力最大,社区居民对居委会的信任和认同程度每上升1个标准差,社区凝聚力会上升0.58个标准差;社区社会资本和移民比例的影响相对较小且相差无几,它们每上升1个标准差,社区凝聚力会上升约0.25个标准差。这意味着,基层社区的治理水平对社区凝聚力的高低起着决定性作用,治理失效命题得到支持。

线性回归模型和半参数回归模型结果均显示,社区贫困(用低保户比例变量来表示)有可能对社区凝聚力造成负面影响,但并没有通过统计检验。为揭示其中的原因,表2利用逐步回归分析,分别控制移民比例、社区社会资本和社区治理变量来观察低保户比例变量的表现。模型1显示,只控制移民比例变量时,低保户比例确实对社区凝聚力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经济剥夺命题得到支持);模型2只控制社区社会资本变量时,结果仍然如此(经济剥夺命题再次得到支持);但当模型3控制社区治理变量时,低保户比例对社区凝聚力的负面影响却变得不再显著,而且,回归系数也大幅下降。这说明,贫困社区的社区凝聚力之所以较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社区的治理水平也较差,一旦改善了治理水平,就可以消除贫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由此,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就更加突显了,更加验证和支持了治理失效命题。

表1 线性回归与半参数回归模型的结果

	线性回归		半参数回归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化 回归系数	
移民比例	4.173** (1.435)	0.253	-
低保户比例	-13.416 (10.536)	-	-8.525 (10.929)
社区治理	3.208*** (0.526)	0.576	3.139*** (0.504)
社区社会资本	1.751** (0.602)	0.259	1.670** (0.6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R ²	0.61	0.61	0.58
N	60	60	60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商品房比例、老年人口比例、社区总户数和截距项。***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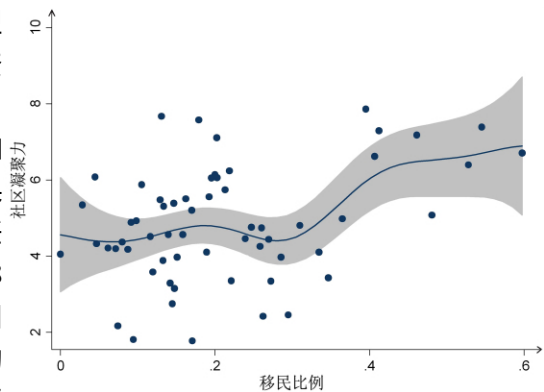


图1 半参数回归模型的结果

(三) 多层次分析

多层次分析的 HLM 模型结果见表 3,由简到繁依次估计了一系列模型。在估计这些模型之前,没有放入任何解释变量的空模型结果显示,个人层次方差为 1.955,社区层次方差为 0.849,组内相关系数为 0.30,意味着数据中社区凝聚力感受差异的 30%来自社区之间的差异,这是相当高的。

模型 1 加入个人层次解释变量,得到几个有意思的发现:(1)教育程度越高,对社区凝聚力的感受或评价越低,但这只在高中毕业组有统计显著性;(2)相对于出生在上海的本地人,非正式移民(尚未获得上海户籍的人)的社区凝聚力感受显著更低,正式移民(出生在外地但后来获得上海户籍的人)的社区凝聚力感受也有较低的倾向;(3)按住房产权划分,拥有 1 套房(自住业主)的社区凝聚力感受显著更高,但拥有多套房的社区凝聚力感受却有较低的倾向。上述变量,连同其他控制变量,一共解释了个人层次方差的 6%。

模型 2-3 再加入社区层次解释变量,构成完整的多层次模型,得到了与前面汇总层次分析同样的结果。不控制社区治理绩效时(模型 2),低保户比例对社区凝聚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一旦控制(模型 3),该影响就消失了,而且社区治理绩效本身对社区凝聚力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模型 2-3 中,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与社区凝聚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移民比例也对社区凝聚力具有促进而非削弱作用。在模型 3 中,这些变量,连同其他控制变量,一共解释了社区层次方差的 64%。

最后,模型 4 使用线性样条函数,在移民比例变量取值为 0.3 处分段估计它对个人社区凝聚力感受的影响,结果仍然发现,在低端取值段,移民比例不对社区凝聚力构成显著的影响,但在高端取值段,却对社区凝聚力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社会资本和社会治理变量的正面显著效应也始终存在。总之,关于移民比例、经济贫困、社会治理与社区凝聚力的关系,这里的多层次分析结果与前面的汇总层次分析结果高度一致,没有支持移民威胁命题,但支持

表 2 逐步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低保户比例	-27.365* (13.042)	-32.503* (13.438)	-2.955 (11.725)
移民比例	5.163** (1.911)		
社区社会资本		2.096* (0.806)	
社区治理			3.329*** (0.6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R ²	0.274	0.268	0.471
N	60	60	60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商品房比例、老年人口比例、社区总户数和截距项。***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表 3 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个人层次变量				
教育(ref. = 初中以下)				
高中	-0.263* (0.110)	-0.262* (0.110)	-0.258* (0.110)	-0.258* (0.110)
大专	-0.223 (0.140)	-0.224 (0.140)	-0.229 (0.139)	-0.230 (0.139)
本科以上	-0.239 (0.155)	-0.234 (0.155)	-0.243 (0.154)	-0.242 (0.154)
户籍(ref. = 上海人)				
正式移民	-0.081 (0.188)	-0.076 (0.188)	-0.096 (0.187)	-0.102 (0.187)
非正式移民	-0.621*** (0.144)	-0.640*** (0.144)	-0.636*** (0.142)	-0.633*** (0.142)
住房产权(ref. = 无)				
拥有 1 套房	0.324* (0.133)	0.311* (0.133)	0.306* (0.131)	0.305* (0.131)
拥有多套房	-0.021 (0.155)	-0.063 (0.153)	-0.047 (0.150)	-0.048 (0.15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社区层次变量				
移民比例		2.416** (0.767)	2.220*** (0.608)	
移民比例(低端取值段)				0.756 (1.094)
移民比例(高端取值段)				4.315** (1.447)
低保户比例		-14.583** (5.306)	-5.851 (4.424)	-4.732 (4.392)
社会资本		0.865** (0.321)	0.819** (0.254)	0.801** (0.249)
社会治理			1.334*** (0.221)	1.303*** (0.21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人层次方差	1.832	1.831	1.831	1.831
社区层次方差	0.902	0.527	0.302	0.287
个人样本数	1718	1718	1718	1718
社区样本数	60	60	60	60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个人层次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收入、职业和截距项,社区层次控制变量包括商品房比例、老年人口比例、社区总户数。***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了经济剥夺和治理失效命题。

五、总结与讨论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社会尤其是欧美学界日益关注社会凝聚力问题,除了竞相开发社会凝聚力指标体系之外,还重点围绕种族多样性是否会削弱社会凝聚力展开了理论争辩与实证分析。最早的研究发端于美国,对此问题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当研究者将目光从美国转移至欧洲、同时将分析单位从地区细划至社区时,却发现多样性对凝聚力的负面影响在经验证据上却并非那么确凿。相比之下,社区劣势或社区剥夺才是影响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因素。这些研究也启发我们,在探讨社会凝聚力的影响因素时,不同国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情境是一个重要考量。

当代中国城市社会也面临着大量移民涌入及其所带来的族群关系紧张问题^[32],但却十分缺乏对社会凝聚力的专门研究和讨论,对社会凝聚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严重滞后于海外同行。因此,本文旨在回答中国城市社会中社区特征如何影响社区凝聚力这一问题,重点检验移民威胁、经济剥夺和治理失效三个命题。使用来自上海市 60 个基层社区及其成员的两层次匹配数据,本文在汇总层次分析和多层次分析中均发现:移民不仅没有损害社会凝聚力,甚至可能具有相反效应;社区经济剥夺固然会削弱凝聚力,但也受到社区治理绩效的补偿;在中国城市社会的制度背景下,基层社区的治理绩效成为社会凝聚力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为何移民比例较高的社区反而凝聚力更强?本文的定量分析无法明确回答,但对“浙江村”等外来人口聚居区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移民需要紧紧抱团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33]。此外,“接触理论”也提供了一种答案,它的含义是,在具有种族多样性的社区或地区,只要人们尤其是不同种族的人们彼此发生交往,而非相互孤立或隔离,就会从交往中慢慢产生理解、接纳、信任和认同,进而缓解冲突乃至增强凝聚^[34]。具体深入的原因分析,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

另外,西方的研究发现社区经济剥夺是削弱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因素,而本文研究发现社区经济剥夺的负面影响受到社区治理绩效正面影响的补偿,这又是为什么?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国内外城市与社会治理方式的差异有关。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城市,居住区的公共品主要由区内居民自行负责,受市场力量和机制影响较大,但在中国,城市政府统一承担和提供了辖区范围内所有居住区的公共品(包括社区资源和社区管理),可能抑制了社区之间的分化程度。中国与西方的制度差异是否以及如何导致了社会凝聚力决定过程的诸多差异,值得展开进一步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 [1]郑秉文主编《社会凝聚:拉丁美洲的启示》,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0 年版。
- [2]Dragolov, Georgi et al. 2013. “Social Cohesion Radar, Measuring Common Ground: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Social Cohesion Methods Report”, <http://social-cohesion.net>.
- [3]Markus, Andrew. 2014. “Mapping Social Cohesion: The Scanlon Foundation Surveys 2014”, <http://monash.edu/mapping-population/>.
- [4]Jenson, J. 1998. “Mapping social cohesion: the state of Canadian research. Canadian Policy Research Networks”, CPRN Study, no F/03.
- [5]Dickes, Paul, Marie Valentova, and Monique Borsenberger. 2009. “Construct Valid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 Common Measure of Social Cohesion in 33 European Countri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8(3): 451-473.
- [6]Chan, Joseph and Elaine Chan. 2006. “Charting the State of Social Cohesion in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187: 635-658.
- [7]Chan, Joseph, Ho-Pong To, and Elaine Chan. 2006. “Reconsidering social cohesion: developing a definition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mpirical research”,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5(2): 273-302.
- [8]Sampson, Robert J., Stephen W. Raudenbush, and Felton Earls. 1997.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Science*, 277(5328): 918-924.
- [9]Lochner, Kimberly, Ichiro Kawachi, and Bruce P. Kennedy. 1999. “Social capital: a guide to its measurement”, *Health & Place*, 5(4): 259-270.
- [10]Portes, Alejandro, and Erik Vickstrom. 2011. “Diversity, Social Capital, and Cohes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7(1): 461-479.

- [11]张海东、石海波、毕婧千《社会质量研究及其新进展》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 [12]武艳华、黄云凌、徐延辉《城市社会凝聚的测量:深圳社会质量调查数据与分析》,载《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 [13]孟祥斐《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载《天府新论》2014年第1期。
- [14]Alesina, Alberto, and Eliana La Ferrara. 2002. "Who trusts other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5(2): 207-234.
- [15]Costa, Dora L., and Matthew E. Kahn. 2003. "Civic Engagement and Community Heterogeneity: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01): 103-111.
- [16]Putnam, Robert D. 2007. "E Pluribus Unum: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2006 Hohan Skytte Prize lecture",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30(137-174).
- [17]Stafford, Mai, Mel Bartley, Amanda Sacker, Michael Marmot, Richard Wilkinson, Richard Boreham, and Roger Thomas. 2003. "Measur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 Social Cohesion and Material Deprivation in English and Scottish Neighbourhood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5(8): 1459-1475.
- [18]Letki, Natalia. 2008. "Does Diversity Erode Social Cohesion? Social Capital and Race in British Neighbourhoods", *Political Studies*, 56(1): 99-126.
- [19]Tolsma, Jochem, Tom van der Meer, and Maurice Gesthuizen. 2009. "The impact of neighbourhood and municipality characteristics on social cohesion in the Netherlands", *Acta Politica*, 44(3): 286-313.
- [20]Laurence, James. 2011. "The Effect of Ethnic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Disadvantage on Social Cohesi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Social Capital and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UK Communiti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1): 70-89.
- [21]Fieldhouse, Edward, and David Cutts. 2010. "Does Diversity Damage Social Capit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eighbourhood Diversity and Social Capital in the US and Britai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Revue canadienne de science politique*, 43(02): 289-318.
- [22]Delhey, Jan, and Kenneth Newton. 2005. "Predicting Cross-National Levels of Social Trust: Global Pattern or Nordic Exceptionalism?",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1(4): 311-327.
- [23]敖丹、邹宇春、高翔《城镇居民普遍信任的区域间及区域内差异分析:基于“资源因素论”视角》,载《社会》2013年第6期。
- [24]陈群民、张海东、李显波《东中西部六城市社会质量比较调查报告》,载《科学发展》2015年第9期。
- [25]张蕾《全球化视野下的社会凝聚:理论与实践探索》,载《世界民族》2010年第3期。
- [26]邢占军、李莎《生活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凝聚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
- [27]黎熙元、陈福平《社区论辩: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 [28]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 [29]蔡禾、贺霞旭《城市社区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以社区邻里关系为研究对象》,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 [30]吴晓刚、孙秀林《城市调查基础数据库助力社会治理》,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第6期。
- [31]Buckner, John C. 1988.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neighborhood cohe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6(6): 771-791.
- [32]李煜《利益威胁、文化排斥与受挫怨恨——新“土客”关系下的移民排斥》,载《学海》2017年第2期。
- [33]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飏《“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 [34]Stolle, Dietlind, Stuart Soroka, and Richard Johnston. 2008. "When Does Diversity Erode Trust? Neighborhood Diversity,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Interactions", *Political Studies*, 56(1): 57-75.

Migrants Threat, Economic Deprivation or Governance Failure

——Social Cohesion Comparison Across 60 Communities in Shanghai

LI Jun,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social cohesion, especially its relation to racial, ethnic and immigration diversity, has been a hot issu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inquiry is also applicable to today's urban China, however, relevant study is very scarce and descriptive. Using a unique survey data including individual and administrative variables across 60 communities in Shanghai,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whether and how social cohesion is affected by three theoretically important community factors in Chinese socio-institutional context. It finds that economic deprivation, rather than the influx of migrants, significantly weakens social cohesion, whil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compensates this negative effect and plays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all determining factors.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robust and consistent in aggregate-level and multi-level data analysis.

Key words: migrants; governance; communities; social cohesion

责任编辑 吴兰丽